



HUBEI CHUBAN
SHI ZHI ZILIAO
XUANJI

●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 第八辑 ●

4
1990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第 八 辑

(1990 年第 4 期)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

第八辑

(1990年第4期)

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选编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7印张 172,400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2,300册

(内部读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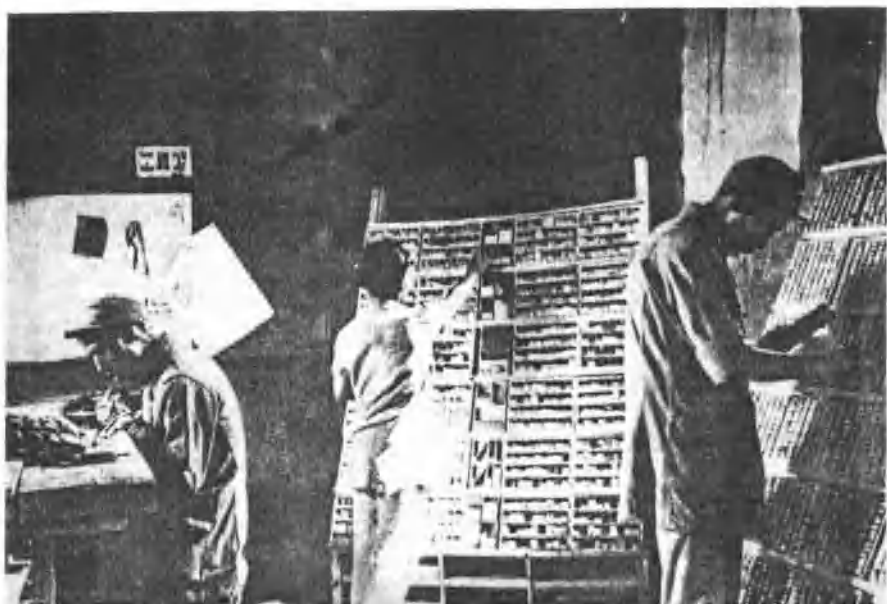


(左) 冀察热辽区1947年12月创办的刊物《群众文艺》一卷三期封面
 (右) 热河省文协1946年6月创办的刊物《热潮》第三期封面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热辽区我党创办的《冀热辽日报》、《群众日报》、《民声报》、《牧农报》、《群声报》、《翻身报》、《人民报》、《热中报》和《新热辽报》

院下/1064/08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画报》社的工人在山沟里简陋的排字房里排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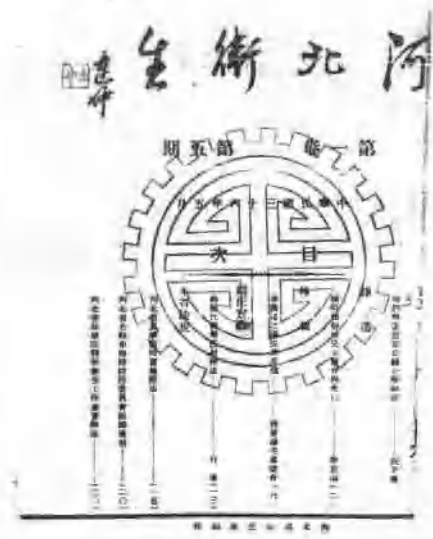
试读《晋察冀画报》社印刷厂的工人们手工精心印制画报



保定育德中学同学总会创办的《育德月刊》1929年二卷二期封面



民国二十三年（1934）保定新青年社出版的《保定新青年》一卷八期封面



国民政府河北省卫生处民国三十六年（1947）出版的《河北卫生》一卷五期封面



国民党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编辑的《河北前锋》民国二十年（1931）十期封面



(左) 民国二十六年 (1937) 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印书馆出版的官话小说《道真来华》封面
 (右)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保定群玉山房出版发行的翻译小说《安戴耐蒂》封面



民国三十一年 (1942) 石门新报社出版的《石门新指南》和民国三十三年 (1944) 出版的《微言集》

目 录

- 晋察冀日报社的书刊出版工作……………曹国辉(1)
- 《前线报》简史……………郑耀东 执笔(22)
- 黎明前的《黎明报》……………劳成之(42)
- 武强年画业恢复初试……………田 零(52)
- 回忆《救国报》滦西分社……………王雪松(56)
- 漫忆冀中《导报》创刊前后……………彭法荪(64)
- 张家口教育出版社始末……………桑 平(67)
- 张家口第一次解放后印刷出版概况……………谢 江(70)
- 张家口中华书局始末……………赵嘉林(73)
- 解放前石门的报刊……………汪 群 摘录(80)
- 日伪时期“华北出版普及会”会则及河
北会员名簿……………张 仪 辑录(82)
- 民国时期河北部分报刊书籍
目录(一)……………肖 礼 辑录(92)
- 河北金元明清时期刻版印书概叙……………萧新祺(123)
- 《畿辅丛书》及其子目版本考……………雷梦水(128)
- 河北在天津出版史料选录……………骆志安 辑录(145)
- 《大名县志》中的编著家及碑拓……………呼中汉 查录(155)
- 《光绪顺天府志》中有关现
河北部分出版资料……………马保超 查录(179)

河北古代几位著作家及其著述.....	雷梦水(196)
衡水“三义堂”书铺八十年	
沧桑略述.....	郭世法 口述 耿宝元 整理(208)
明清时期河北部分刻书目录.....	李远杰 整理(215)

晋察冀日报社的 书刊出版工作

曹国辉

(一) 报社“还要办成出版社”

《晋察冀日报》作为晋察冀边区的党报，一直关注和指导着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邓拓同志1938年12月11日在报纸创办一周年的纪念文章《这一年来》中写道：

“自抗战以来，广大人民对于战时知识的需求也普遍地增强，这一需求，更推动着新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这样整个的文化界出版界，就大踏步走进战斗中去，而且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文化出版事业自然而然地就从少数中心的城市逐渐转移深入到内地偏僻的乡间……”

还在这年6月27日，邓拓同志在《〈抗敌报〉五十期的回顾与展望》中，就表示过要办出版社：“有许多热心战时文化事业的同志，拟议集资设立一个商业性的群众的出版社，本报亦极端赞同”，“本报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全边区的抗战的文化工作，已决定加入该社，为其整个出版事业之一部门。”后来由于情况变化，这个愿望虽未能实现，但报社仍然独自承担了出版社的重担。

1938年“七一”党的生日过后几天，邓拓同志拿着一本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找到报社印刷厂负责人周明同志，赞扬上面刊载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说这是指导抗日战争

的理论武器，要让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很快都能读到，并说：“我们的报社，不但要出报，还要出书，还要办成出版社。抗战一周年就要到了，我们就用‘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先印这本书吧。”这时候，报纸正准备由石印改为铅印，铅字还只有二、四号各一副和五号半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邓拓同志以高度的革命热情，一方面抓报纸的改版，8月16日由石印改为四号字铅印；同时，抓了边区第一本铅印书的出版。从9月10日到30日，在报纸头版头条位置上，连续刊登了“七七出版社”出版《论持久战》的大幅预约征订广告，广为宣传。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用四号字排版，缺字时用两个字的偏旁磨成半边拼凑，或以“×”、“△”、“○”等符号代用，三眼订毛边装。印装过程中，又收到延安出版的单行本，发现其中文字上有一些改动，为了对读者负责，就在印好的书后加了一张正误表。虽是这样印装简陋的书，却将持久抗战的光辉思想传遍了全边区。

这本书对于边区的出版工作具有开创性的重要作用。这是晋察冀边区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出版的第一本铅印书。以后凡是毛泽东同志有新作问世，报纸发表后即及时印成单行本发行。这成为报社一个不成文的制度。

“七七出版社”的名义并没有固定使用下去。不久报社还印过一本国际友人白求恩著的医务人员培训教材《疗伤初步》，由董越千翻译，用“太行书局”的名义出版。以后，大多出版物上印“抗敌报社出版”，后来是“晋察冀日报社出版”，在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成立后，也用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的名义出版发行。

（二）书刊出版不断发展

随着边区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建设的发展，文化出版事业也不断发展。报社的印刷厂到1939年由一个厂发展到两个厂，1941

年又发展到三个厂，印刷设备、印刷技术和人员增加了；一批批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同志来到边区；特别是党对出版事业的重视，并有延安党中央出版发行部进行人力、物力以及书稿、样本和纸型的支援，使报社出版的书刊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

1938年5月10日，晋察冀边区在《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级宣传部加强对群众团体宣传工作的领导，立即调查当地有多少种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内容怎样，对它们怎样领导等。8月21日《抗敌报》报道：“边区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出版报刊将达50种”。12月29日在社论《论边区的文化运动》中谈到出版物数量不如从前多，但内容与形式则有了大的进步，发行量比过去增加两倍以上；然而出版物所拥有的读者仍不及人口的2%。1939年10月11日又在《深入边区的文化运动》的社论中宣布：“在出版物方面，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新的进展，现在单就铅印的定期出版物讲，目前已有四、五种，而适合于今天抗战需要的各种丛书，已开始在现有印刷条件的可能范围内大量而有计划地刊行着。”

这里所指的是对全边区而言，而其中所指的铅印定期出版物和丛书，则全是报社印行的。

从1938年到1940年，报社出版的 书刊达到326.8万字，71.6万册。到1942年的五年内，共出版各类书刊180多种，110多万册。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和实行精简，1943年出版数量有所下降；到1944年又有回升，年底曾向读者预告：1945年将出书150种；由于日本投降，情况起了变化。大约估算，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报社出版的公开和内部发行的书刊有300多种。

抗战时先后出版的定期刊物有：边区政府主编、指导政权建设的月刊《边政导报》(1938年6月13日创刊)，边区文教会主编、推动大众文化的月刊《边区文化》(1939年4月创刊)，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主编的政治理论半月刊《新长城》(1939年7月创刊)，抗

敌报社主编的时事政治周刊《抗敌周报》(1939年7月创刊),边区群众团体主编、指导群众运动的月刊《群众杂志》(1939年10月创刊,1941年7月改名《晋察冀群众》),1942年又改为《群众报》,边区政府教育处主编的《边区教育》(1938年创刊,1943年改名《教育阵地》),成仿吾、何干之主编的大型文化与艺术综合杂志《五十年代》(1941年5月创刊),晋察冀日报社主编的供国际友人阅读的英文版《晋察冀杂志》(1943年5月创刊)等。其中有的因形势和组织变化而改出新刊或停刊,有的(如《边政导报》、《教育阵地》等)一直出版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些刊物大都是由报社出版印刷发行的。

当时十分注重大众化通俗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1939—1940年出版的几套丛书即表明了这个意向:大众读物编刊社编辑的《通俗大众自学丛书》共五辑,第一辑中包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初步》、《马列主义初步》、《三民主义初步》、《政党派别》、《日本的透视》、《社会发展简史》、《苏联概况》、《战时科学知识》、《读报常识》等。抗战文化学社主编的《通俗社会科学丛书》,第一辑是:《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包括《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甚么是资本主入》、《甚么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等六个分册。编者声明:“为推进边区文化,普及战时大众教育,适应抗战新阶段之需要,不顾印刷材料之昂贵与环境之困难”,特发行上述丛书。其他有专为妇女和青年编写的丛书:《妇女丛书》中有《妇女运动论集》等;《青年抗战建国丛书》中有《中国青年运动的新方向》、《目前青年运动的任务》、《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传统、目前特征及其动向》、《青年与民主运动》、《青年的学习与修养》、《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汉奸汪精卫》、《我们的歌声》(一、二集)等。1941年出版了《儿童丛书》和《青年儿童文艺丛书》,其中有《革命家的传说》、《鲁迅、鲁迅的故事》(孙犁著,沙可夫作序)等。1942

年出版了《小学教师丛书》，内有《新教育和新教师》、《怎样做个新教师》。1944年出版了《时事丛刊》。1945年出版了《边政读物》和《文艺丛书》。后者是在边区出现群众文艺新方向的高街村剧团《穷人乐》之后，编选了一批专业剧团和群众相结合、群众自己表演自己的优秀剧本。

同时出版了不少配合扫盲运动的识字课本和进行时事政治宣传的通俗读本。如《冬学课本》和《民众识字课本》，报社的美术家阎素同志还为识字课本作了大量木刻插图。《新宪政读本》，在宣传新民主主义宪政和配合边区民主选举运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培养通讯员和摄影员方面，作家孙犁当时是晋察冀通讯社记者，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摄影家吴印咸写了《摄影常识》。吴印咸随延安电影团来到边区，拍摄了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邓拓和沙飞为他写的书分别作了序，邓拓说：“他在离开边区以前的短促时间内，在三伏炎日之下，坐在荒野树林的石头上，挥汗写了这一册精密而实用的《摄影常识》”，“这本书将要发生的作用，决不是文字所足以完全表现的”。全书共70页，附表5张，插图18幅。在1939年11月能排印这样的书不无困难。许多字缺，都需要刻字。这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版的第一本摄影教材，它为晋察冀边区培养了大量的摄影工作者，教材也流传到其他根据地。为配合时事政治教育，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还出版了一些挂图。其中还有彩色精印的，如《敌后抗日根据地形势图》、《苏联西线详图》、《太平洋形势图》、《最新日本详图》等。

当然，报社第一位的出版任务，还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仅在1939—1940年就先后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论新阶段》和《新民主主义论》。后者，是直接根据延安经晋绥边区转来的原稿排印的。毛泽东同志在他修改过的一份复写稿封面上亲笔批示：“送晋西北转五台山彭真同志指正。”下边是他的签名。彭真同志收阅以后即交邓拓同志，嘱立即排印出版。邓拓将书稿一口气

看完后，激动地说：“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当即热情地挥毫赋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初稿》：“万水千山只等闲，长城绕指到眉端。阵图开处无强敌，翰墨拈来尽壮观。风雨关河方板荡，运筹帷幄忘屯艰。苍龙可缚纆在手，且上群峰绝顶看。”1940年3月15日《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在《抗敌报》连载，3月31日刊出新书出版预告：“本书乃毛泽东先生继《论持久战》与《论新阶段》、《再论持久战》之后的划时期的伟大历史著作，实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的光辉成就与精辟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其在马列主义文献中占有如何显耀地位早有定评。凡我抗战军民，均应人手一册。现经本社根据毛泽东先生原稿精印出版……”当年6月还出版了新长城社编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讨论提纲》。1941年出版的《论民族民主革命与统一战线》文集、1942年出版的《毛泽东言论选集》和1944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都收入了《新民主主义论》。此外还特别以“北京佛教总会印、修点道人题《大乘起信论》”的伪装书名，出版了向敌占区秘密发行的特种版本。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后，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七大文献《论联合政府》和《论解放区战场》，是根据延安以最快方式发来的《解放日报》马兰纸单面清样排印的。排校印装工人都尽心尽力，保证了快速和高质量地出版了领袖著作，及时地宣传了七大的精神。

193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曾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和区党委“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的书籍”。晋察冀日报社根据中央的指示，从斯大林《在第18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的总结报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下册）、《共产国际纲领》等书开始，到列宁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恩格斯著的《英国工人运动》，以后陆续出

版了《论共产党》、《论马恩列斯》以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这些书有的是自编自印的，有的是根据延安解放社版本翻印的。延安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出版局）为各地翻印马列著作和其他重要书籍通过机要交通提供了纸型、清样或样本。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著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由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书名，并由朱德、王稼祥分别作序。书稿由晋察冀寄到延安后，毛泽东回信说“是十分宝贵的东西”，准备在延安和重庆出版。1939年底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后，由晋察冀日报社翻印出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同志著的《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一书，也是在延安出版后由晋察冀翻印、党内发行的。还有许多延安出版物，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黎平的《论民族民主革命》，吴黎平、艾思奇合著的《唯物史观》，社会科学研究会编的《社会科学概论》，鲁迅研究会编的《鲁迅论文选集》等书，也据延安解放社版翻印出版。

在艰苦紧张的反“扫荡”游击转战中，《晋察冀日报》不仅坚持了出铅印报纸，而且在1940年冬季和1943年秋季的两次反“扫荡”中先后出版了彭德怀同志著《财政经济建设》和解放日报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解放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已收入）等供干部学习的小册子。

为适应对敌占区斗争的需要，除前述《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版本外，还有毛泽东许多著作和党中央文件，伪装成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红楼梦》，教会读物，或冒充敌人的宣传品《大东亚共荣圈》等向敌占区秘密发行。1945年“七大”以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对伪军、伪组织

人员的宣传，应以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七大报告中所述对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政策为根据，……各区党委、地委的印刷机关，应大量印刷对城市的宣传品，首先是保证《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向城市大量输入。”晋察冀日报社根据党的指示，在公开出版发行这两本文献的同时，专门印制了一种袖珍合订本，用《婴儿保育法》的书名伪装，通过城工部门，散发到敌人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中去。

1941—1942年，边区文化出版事业所呈现出的繁荣景象，从《晋察冀日报》的新闻、广告、书评中都可以反映出来。除了晋察冀日报社的出版物外，边区政府曾办过“点滴（出版）社”，石印书籍、课本；边区文联办过“文化供应社”，油印《晋察冀文艺》等刊物及中、外文艺名著；军区政治部的石印厂，1942年在《晋察冀日报》支援下扩建成铅印厂，并创办了《晋察冀画报》；各专区也办出版、印刷，特别是五专区办的“前卫出版社”，石印了不少图书和课本；冀中文建会也在艰苦的平原游击作战中，油印出版了四辑《冀中一日》，以及孙犁著的《区村连队文学课本》（后由晋察冀日报社铅印出版）等。这些出版物，大都由新华书店总经售。《晋察冀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各种书刊评论，其中有：《〈五十年代〉介绍》（弓）、《看过〈晋察冀画报〉时事专刊以后》（金沙）、《〈晋察冀文艺〉创刊号读后感》（林江）、《〈晋察冀戏剧〉读后》（蓝静之）、《〈晋察冀美术〉读后》（吴嘉珍）、《对创作连环图画说述几点意见》（钟惦棐）、《文艺的绿芽——对几个刊物的评价》（甘城）、《〈冀中一日〉以后》（力编）、《〈小故事集〉读后感》（长怡）等。

1942年下半年起，由于实行精兵简政，除军队系统保留自己的出版机构外，政、群系统都已撤销，或合并到晋察冀日报社来。晋察冀日报社始终担负着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重任。在1945年边区二届群英大会上，因为晋察冀日报社对边区文化出版事业有重大功绩，在反“扫荡”中坚持出报，被评为大会主席团奖励